

第一讲：中国的神权政治思想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政治统治。将人间的政治统治直接上升为天意，在实践活动中，宗教与军事被并列为“国政”的两大领域，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神权政治思想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对于巩固当时的统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夏商周的神权政治思想

夏与周的神权政治思想

所谓“有夏服天命”，夏禹“致孝乎鬼神”，说明夏代已有了假借天命鬼神来通知的情形。夏代有了“天罚”，“天命”的法律本体观，它将法律本身视为天的旨意。

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说明殷商奴隶主贵族极端迷信鬼神。

从卜辞记载看，帝是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权威，统管一切自然现象，主宰人间一切事物。“帝”观念的出现也是原来各族崇拜的不同的神灵不适应统一王国的结果。

殷商统治者不但自称受命而王，而且没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借神意而出。

殷还盛行先祖崇拜，且这种崇拜对上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殷王先祖作为鬼王不仅要管理鬼间世界，而更主要的事帮助在世的殷王巩固其对人世间的统治（吾辈先祖共事，若尔等非心怀二心，吾岂敢滥用法度，若尔等居心叵测，汝辈先祖必将弃尔等不顾，吾将依法惩治之）

从卜辞看，在商代晚期以前，上帝与先祖表现为二元关系，到了商代晚期，又出现了帝、祖合一的现象。纵观中国历史的长河，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旨意，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普遍的现象

周的神权政治思想

周灭商以后，周公继承了商代关于天的观念，认为天是最高的人格神。周人的“天”等同于商人的“帝”，都是宇宙的主宰。

周王变成了天帝之子--天子。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抗或抗拒周王了。周王就变成了神人一体化。人们越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天帝，在现实中就越越崇信周天子，周天子就越具有神圣性。这样，宗教崇拜化为对周天子的肯定。

周人在神学天命观上继承了关于王权禀承天命而得的思想。但是出现了问题：既然如此，你周灭商时，天为何不顾？为了弥合这个矛盾，就出现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只应护有德之君，这样一来，天就有了更多“正义”的色彩。

“惟天惠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思想的主旨是：天爱护人民，倾听人民的意愿，并以之作为自己主宰人世的意志。

周公的“以德配天”把天命、敬德、保民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为以后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

阴阳五行思想与邹衍的武德始终学说

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热衷于把认知能力与宗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以阴阳两极建构宇宙生成图式，在建构和推演过程中，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阐释社会运动规律，其始终循环表现出命运论的特征，全面地体现着原始思维的非理性文化价值。

阴阳五行思想认为，天人和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政治活动只能是保证天人和諧的实现而不能破坏它。

邹衍的五德始终说

战国后期，经历了怀疑神权人的统治以后，建立新型政治的要求已处于酝酿之中。在这一环节上，起国人邹衍经过深思熟虑，指出五德始终说，并以此来干预君主。

五德始终说又叫五德转移说，或称五德转运说。邹衍以五德相胜为基础，通过五德的相胜相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按此说，五德相胜次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历史就是这样按五德相胜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当一个新的帝王将要兴起的时候，上天都会事先降下相应的先兆（也称为符应），由此来判断这一帝王当属的德行，判断他的兴起是否符合天意。

在邹衍的五德始终说的理论中，“灾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邹衍的说法，帝王是受天监护的--一为监督，二为保护。上天以祥瑞和示灾来表示赞许或警告。

其一，五德始终说是在全面总结三代神学政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神学目的论直接为帝王服务。
邹衍的五德始终说主要有三个思想特征：
其二，五德始终说具有先验性，“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其三，五德始终说虽以宗教神学为内核，但邹衍又对当时流行的学说进行了充分的吸收。

邹衍的学说对以后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天下显示出将为秦国所有时，这一学说很快就在秦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秦始皇认为秦朝是得“水德”而建，因此秦朝的一切文物制度皆仿照水德制定--尚黑。（汉朝尚黄，估计土胜水，汉武帝认为自己得“土德”）

邹衍强调历史变易，而且认为历史变易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的五德始终说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他提出了天命无常的思想。如何使德长盛不衰，邹衍认为“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希望以盛衰之论来约束统治者。

孔子知天命言论与墨子天志说

孔子的知天命言论

孔子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

孔子强调“知命”。知命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人们所能做到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

尽管人们对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的看法和结论如何，有些事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我们不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断定孔子的天命观，但是这已经足以被后世的神权政治理论大做文章。

孔子强调“知天命”

孔子“敬”“祭”鬼神

暮年孔子曾为“西狩获麟”而惋惜，也对长时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而伤感。

墨子的天志说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多数学者认为他稍晚于孔子，与孔子同为我国古代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人。

墨子学说的主旨是消弭战乱，革除社会弊端，安定社会民生；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途径是：兼爱、非攻、非兵、节用、节葬、尚贤、非命、天志、明鬼。

墨子反复强调“天之爱天下之百姓”“天爱民之厚”，并把统治者分为顺天意的“义政”--圣王，反天意的“力政”--暴王。在墨家看来，“天”是有意志、有爱好、能惩恶扬善、具有无限权力的人格神。

他认为被统治者的政治义务只是尚同，即服从（当然也不排除“上有过则谏之”）。为了防止统治者成为暴王，墨子为自己的专制主义的“尚同”理论规定了一个附加条件：一方面是尚同必贤的原则，另一方面就是以“天”来约束、限制统治者，即他的“天志”说。墨子的“天志”有两重意义：

墨子设想的这种以尚贤和天志为条件而实行的尚同，在理论上可以说成是一种有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在实践中就只能成为无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了。

一是要统治者效仿古圣王，顺天之意去兼爱天下百姓，实现社会安定

二是要用“天”来警告和恫吓统治者，以起到对统治者的威慑和约束作用

梁启超说墨子的“天”是对君权的一种“所以制约之法”，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

天人相合思想

“天人相合”是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起点，它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金岳霖教授曾说：“我们若将天既解释为自然之天，又解释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谛。”冯友兰评价认为，金岳霖这个说法非常适合董仲舒。

董仲舒首先从“以类合”的角度对“天人相合”思想进行阐发。由于从内在要素和属性看，天人皆有五行和阴阳，因此找到了人与自然界相互之间的公同点和相似之本质，从而奠定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理论基本思路。他把凡是自然现象和人身或社会政治现象数目相同的都扯到一起。无论在构造上、情感上、思想上还是伦理道德上，人都不过是天的副本。所以董仲舒的结论是“以类合一，天人一也”

天人感应

董仲舒建立在“天人相合”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提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具有相互影响、互为感应的关系。“天人感应”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警告和嘉奖。

祥瑞和灾异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	都出现在事实发生之前，带有一定的预言性
	都必须寄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即“天无以言，而意以物”
	标志物的出现肯定代表着天意，是纯粹的“受命之符”，而绝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能招致。

董仲舒运用“天人感应”这一套理论，使世俗的封建王国罩上神圣的光环，以此证明封建专制君主政权之合理性、永恒性。但他的“天人感应”说，又非奴隶制社会君权神授说的简单重复，不是绝对的君权论。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利益出发而加工制造完整系统的君权神授说。

君权神授与三纲五常

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他把君主看作国家政治的核心。为了给君权提供合理依据，他提出了“君权天予”说。在他看来，人们不能直接与天联系，其间必须由帝王或圣人作中介。

董仲舒奉天，并非仅仅为了提高君主的权威，相反，主要是要求地上的君主自觉约束于天，按天道行事。

根据阴阳观念，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

董仲舒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用“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又依据孔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仁义礼智信。这样一来董仲舒就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加以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三统说

“三统说”也即“三正说”，是儒家今文经学的重要原理之一。大体而言，三统说的基本含义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专属自己的一“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如果违背天命，暴虐无道，那么其“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将由另一个新王朝“承天应命”来替代。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表明新受天命的开始。

董仲舒认为历史上虽然不断地发生改朝换代的事，但这只是封建统治形式的改变，决不会改变其实质，也就是说，废旧王，立新王，但像君为臣纲这样的大纲、人伦等是不可改变的。

董仲舒执行了这样的任务：

他给新宗教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把阴阳五行说提到神学的体系上来，把“天”提到意志的至上神的地位上来，把儒家伦常的父权和宗教的神权以及统治者的皇权三位一体化。总的来说，董仲舒完成了“天”的目的论。

“讖”，即所谓能够“预卜吉凶”的预言；“纬”，是对“经”而言，即用迷信或谶言对儒家经典进行引申、解释和比附。

汉代谶纬神学

谶纬之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核心是天人感应说。谶纬在广泛比附天道的阴阳消息与人道的吉凶得失息息相关的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八卦的象数结构、卦气的衰旺变化、五行的更盛规律，“因阴阳”而“定消息”，以预测认识吉凶得失；并在今文经学崇奉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孔子神化。

《白虎通》神学政治思想

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在白虎观亲自主持全国的经学讨论会。会议记录由班固编辑成《白虎通》，它以董仲舒神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把儒学经学同谶纬迷信捏在一起。

《白虎通》解释宇宙根源，把五行阴阳说庸俗化、神秘化，认为君权父权权威之下的一切制度都是天所指挥的五行变化的征候，也即是神恩赐给封建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谈灾异警告。

《白虎通》融儒家等级化原则和谶纬神秘思想为一体，以神化君主、封建等级制度和三纲六纪，这无疑意味着长期流行的谶纬神秘经学得到了国家“法典”的地位。